

一本研究新马生态文学必读的书

——诗评家的批评与学者的论述

王润华¹

一、生态书写与批评感知力的展露

1989年伍木出版《无弦月》，我给他写了短序〈创作的省思〉：

读伍木的散文，有三种文学的本质在吸引住我，使我往返的欣赏和体味。《无弦月》是一本散文集，它集合了华文文学各种散文的特质，其中有叙事、抒情、议论、纪游和报导，可是除了散文的各种特质，伍木又把诗和小说带进他的散文世界中，这就造成他的散文可读性非常的高，内容和思想都很有深度。

《无弦月》中的散文如〈树姿〉、〈汶莱——宁静和平之乡〉等文透露他书写环境的心愿。

到了1994年，他出版了第一本诗集《十灭》，共收78首诗；最早期的作品写于1979年，当时他只有18岁，最迟的是1994年，那年他33岁。这时期他还未读大学，硕博学位更是后来的人生策划。我发现伍木在第一本诗集就逐渐呈现了他自己的书写风格，创造了环保书写主题，我大胆预言这是伍木天生的敏锐视角，因为没有被传统的旧想象困住：

¹ 王润华，南方大学学院资深副校长。

艾略特在《圣林》（Sacred Wood）中指出，艺术家固然需要接受他所从事的那种艺术的有关教育，但这种教育有时往往造成妨碍大、帮助小的效果，因为普通教育都是为普通人而设计，它的非个人的、没有人格个性与感情的思想知识（impersonal ideas），会破坏一个人敏锐的感受系统。想法一致的知识会模糊个人的独特视野与想象，阻止个人的超然的见解产生。（〈濒临绝灭的动物、族类与传统悲歌——读伍木诗集《十灭》〉）

我读了《十灭》，为他的第一本诗集写了〈濒临绝灭的动物、族类与传统悲歌——读伍木诗集《十灭》〉简单的感言。伍木是麦当劳青少年的第一代，却把自己放逐，去做社会边缘的苦吟诗人，令我惊讶又惊喜。他终日啃《水浒传》、《红楼梦》以及唐诗宋词；伍木在〈蠹〉这首诗中说，像他这样的族类已经濒临绝种了：

这样的族类已经很少了
日啃《水浒传》，夜枕《红楼梦》
闲暇
还在《西游记》的扉页上
留下几个窟窿

故墨黄纸都不放过
瞧那一套《三国演义》
若眉批，若注脚
满满是斑剥的痕迹

你们是濒临绝种的族类
终日陪着楚辞汉赋唐诗宋词
与书为伍，以书为生
穷一辈子呵
逐书

这本诗集《十灭》中的诗，就是书写这个地球严重受到污染与破坏之际，世界各地面临绝种的动物与文化。伍木的〈十灭〉组诗曾获得第六届金狮奖诗歌组佳作奖，描写了世界各地面临绝灭威胁的十种动物，从中国的金丝猴和华南虎，到北美的雪豹和非洲的羚羊，它们都无奈地等着绝灭。文化人，特别是诗人也有濒临灭亡的恐惧。〈羚羊〉有这样的一段：

非蛮非野
放逐的日子
缘何总是
以恐慌和惊悸果腹？
活在被擒被猎的阴影
任由孤绝的伤口恣意淌血

伍木不只担心动物与人类绝灭，在这个科技统治的地球上，传统文化也有消失毁灭的危机。〈城市〉一诗中，他看到印族同胞为旧传统的保存而作最后努力：

那边厢印族同胞击鼓而歌
联络所一隅，有人正和城市主调抗衡
为一种名曰亚洲文化价值的东西
在大清早
作最后的力挽

伍木算是末代华校生，是一位危机意识、历史感极强的华文作家。他的第一本诗集《十灭》的中心书写，就是针对地球上各种面临绝种的飞禽走兽与人类。伍木不但担心动物与人类有绝灭的威胁，他目睹在这个科技统治的地球上，文化传统也面临毁灭，尤其是新加坡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传统。伍木的万物与文化生态焦虑感，实际上也贯穿在2001出版的《火浴的族类》这本评论集中。伍木通过与作家的对话，对文学团体、文学刊物、文学活动与文学作品的分析，他一直

担心承先启后的文学传统快要消失，文学的天空逐渐模糊，而那些火浴的族类的作家也濒临绝灭。这是他对文学与文化生态书写的开始。

2001年出版的《火浴的族类》这部年轻之作的评论（最迟1995年作品），构成一种新史学主义（New Historicism）：对外部的一些不连续的、断裂的现象，由外部问题转向内部问题，这些短评比一些综合性的大叙述，更准确地告诉我们新加坡华文文学的生态问题。伍木对许多不同的小事件、小现象的分析，就是后现代所说的小叙述，对大叙述提出很大的挑战。要真正了解近几十年的新加坡华文生态，我建议读一读这本文集，而不是那些文学史的大叙述，后者的可信度已受人怀疑。

二、诗人批评家或工作室批评的文学批评研究

伍木早在1993年出版的《至性的移情》，是作者尝试建立属于自己的时代的文学批评的第一次努力成果，非常“诗人批评家”的文学批评。伍木本人写诗，作品收集在《八人诗汇》、《十灭》、《五月现代诗选》等诗选中，又写散文，已出版《无弦月》，曾获得1987年新加坡金狮奖散文组优胜奖，另外他又创作极短篇小说，一些代表作被收入《新加坡微型小说选》及《微型小说佳作选》。伍木这本评论集《至性的移情》评析的单篇作品或集子，正好都属于诗、散文与小说这三种体裁的创作。我在〈文学批评的新领域——读伍木文学评论集《至性的移情》〉就曾考察伍木所写批评文章的特质。我大胆定义，把他的批评定位为诗人批评家（Poet-Critic），这类批评家本人也是诗人（诗人指广义的作家）。

庞德（Ezra Pound）认为搞文批的人就如修理汽车的人，如果批评家有创作的经验，就懂得作品每一个组成部分之性能与与其相互匹配的奥秘。同样的，如果修车的人懂得驾驶，就容易测验机件的操作的情况，结果会很准确的分析出汽车的性能或断定其毛病。艾特略把诗人批评家的评论称为“工作室批评”（Workshop Criticism），因为

这种批评文章通常是作者在从事创作之余，行有余力的副产品，他跟学者型的批评家为批评（或为学术）而批评的出发点不同。诗人批评家的最佳评论，往往在于跟他在影响上有渊源的作品，或至少与他的作品同一思想与风格路线的作家之作品。伍木在〈返璞归真〉的论文中说：“除了古诗词之外，迄今为止，我只背读过两位现代诗人的诗作，那就是台湾的余光中以及我国的董农政。”由此可见，余光中与董农政至少是伍木喜欢和熟悉的诗人，因此伍木在评论董农政的作品时（一共两篇），非常有见解，而分析韦铜雀的〈青瓷杯〉时，他说：“一开始错愕，随之惊喜，然后觉得这首很余光中的〈青瓷杯〉……”，由于他与韦铜雀都爱读余光中的诗，都在余光中的影响下，所以伍木分析韦铜雀的诗时，特别有信心，一共写了五篇。

而这种“诗人批评家”、“工作室批评”的批评的长处是分析自己追求的创作，由于自己也创作这种作品，所以见解深入，往往一针见血。当诗人批评家去评析那些与自己作品毫无关系的作品时，他的缺点与局限性就暴露无遗，因为他的判断力将大大降低，他会不知如何去解剖。伍木很明白自己的能力，所以在这本评论集中，他所评析的绝大多数是与他同时代而且一起搞创作的作者的作品，一些比他年长一辈的人，如蔡欣、吴垠、廖青，都是他熟悉的作家，而且曾向他们“学习过”的作家。作为一个诗人批评家，伍木是为创作而批评，为批评而创作。

三、从局限性到学术性的批评研究：从作家伍木走向学者张森林

张森林的《朝向环境伦理：新马华文诗文中的生态书写（1976-2016）》展示伍木创作室批评没有停留在个人敏锐的感受与思考系统上，他再加上的学术性，把他的文学阅读推到更高的境界，因为他不断寻求在文学研究的专业训练。伍木最后走进大学，前后进修而且获得文学学士、硕士与博士学位。接受完整的文学研究训练后撰写的《朝向环境伦理：新马华文诗文中的生态书写（1976-2016）》，

我很强烈感受到诗人伍木变成学者张森林的蜕（突）变。当他是伍木时，他是诗人批评家，他对影响过他的诗作的评论具有权威性，因为他是一位有创作经验的艺术师（craftsman），很多是创作经验之谈。但艾略特指出创作室批评的二大局限：“像这种诗人所写的文学批评（我又称为创作室的批评），有一种很明显的局限。当它和诗人自己的作品没有关系时，或是他所不喜欢的，他就无能为力。另一种创作室批评的局限就是，当他所评论的问题属于他的创作艺术以外的，他的判断往往会有所偏差。”

诗人批评家的文学批评常常有其局限性，他是为创作而批评，为批评而创作，因此他的注意焦点，主要落在与他同时代、风格、主题相似的作者与作品，像董农政、韦铜雀、希尼尔、木子、采凡音、酩酊、梁文福、宇铃、林辉、彭飞等等，年龄虽不一致，但都是差不多和伍木同时期出现文坛。其他人像蔡欣、廖青、周槃、孟紫等的老师辈的作品，都是他作为文学学徒时代喜读的。伍木没有评析过战前或战后早已成名的作家的作品，他很了解自己的长处与局限。

作为一个批评家，任务愈来愈繁重。早期大家只期望文学批评能解释作品，提高读者的阅读能力，这样他们才能喜爱阅读。因此一些批评家拼命的对作品加以解释，由于强调对作品的了解，结果文学批评就等于解释，这样文学批评便沦为科学，让读者误以为他的解释是绝对对的，且是唯一的答案。这种批评最后毁坏了文学作品的多义性与艺术性，同时我们也不能被局限在同一传统的文学作品里。

幸好伍木不停留在这样的批评家层面，因此他在“解释”之外，还有其他方面的批评兴趣。作为一个作家，伍木深深了解到文学作品的复杂性，知道作品中的技巧、生活经验与作品的关系，作品与社会，甚至全人类生态环境等等问题，所以他继续扩大他的生

态书写与研究。但他还是很小心，限制在他自己也参与写作的、熟悉的1976–2016年代，所以他的论题是《朝向环境伦理：新马华文诗文中的生态书写（1976–2016）》，深入追究其研究论述，这是从上述基本著作发展起来的论述，伍木那本评论集《至性的移情》是至关重要的基础。

四、诗人批评家与学者的学术研究：研究这个领域必读的论述

伍木创作室的文学批评，目的是要为与自己的作品或文学传统相同的作品宣扬、建设其理论基础，争取承认，所以我们说诗人批评家是替自己辩护的律师。但是当他撰写《朝向环境伦理：新马华文诗文中的生态书写（1976–2016）》的时候，张森林已经是诗人、散文家、小说家，对文学艺术有创作的丰富经验，也是诗人批评家，有他独具的艺术实践，对作品的见解具有权威性，他能看见普通学者无法洞见的经验之谈，不是纯理论或哲学性的推理分析。除了这些诗人批评家的超越性，完成文学博士学位课程之后他是张森林博士，另一种身份与学养的他对世界的文学作品及理论，特别是生态理论，与1976–2016年代新马华文诗文中的全面生态书写，有特别深广的研究，也熟悉一套严密的生态批评体系。所以他在〈导论〉中说：“本书采用文化批评、文学分析与比较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法。”张森林的这篇〈导论〉与各章的论述必将成为研究这个领域的学者必读的论述。因为他以深入的专题研究（monograph），从生态与政治伦理、生态与人文伦理、生态与社会伦理、生态与科技伦理等角度，论述新马华文文学中的生态书写。更难得的是一般学者所缺乏的，他又具有生态文学的创作经验与诗人批评家的批评，加强其深度与广度：

文学的创作（生产）与传播（接受）并不是处于与外界隔绝的孤立状态的，相反地，每一种文学生产（text）、文学现象或文学运动，都是与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（context）

息息相关、环环相扣的。以新马华文生态诗学为主线，以生态意识和心态为基点，寻找影响心态轨迹变化的社会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与教育等的外在因素，从而回返文学，整理出文学变化的缤纷形态，也是自有其可观性的。

目前很多纯学院出身研究新马文学的学术论文，总是缺少了解如美国学者克利福德·格尔茨（Clifford Geertz）的《文化的解释》（*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*）与《本土知识》（*Local Knowledge*）中的文化，那是本土人自己织出并居于其中的“意义之网”，而张森林便是要找出这些“意义之网”究竟是什么。新马华文文学在殖民与后殖民的冲击下，呈现驳杂性与本土性（hybridity and syncreticity）并存的现象，需要几乎像《文化的解释》与《本土知识》那样的考古，全面梳理的当地文化，以帮忙打开我们的视野，从地理区域及其所有文化属性着手，拓宽研究新马华文文学的领域。

作于2021年1月1日写于新加坡花葩岭